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重要性的 再认识及其借鉴意义

谭 崇 台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60、70年代后为第二阶段。

在两个阶段中,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论证的思路有所不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部门优先次序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这种思路和看法的不同,在农业问题上,最清楚地反映出来。

概括起来说,第一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把农业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第二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重新认识了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继续进步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认识

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条主要思想脉流,是重工业而轻农业。

当时,从不同的侧重点,表现重工轻农的发展理论,一般认为有三种。影响最大的是发展经济学家先驱人物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提出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

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出发,即国民经济中具有两种结构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仅足糊口的、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存在着只有极低的、低到零甚至负数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工业部门,这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远比农业部门为高。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剩余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个部分,把这部分除掉以后,在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增不减的条件下,产出总量并不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这部分劳动形式上是就业的,但实际上对生产并未起任何作用,或者说,只能起极其微小的作用,甚至反而障碍生产的进行,当这部分劳动有机会能在他处就业而离开农业部门之后,余下的劳动力可以保持产出量并不减少。因此,这部分劳动力实际上处于隐蔽的,伪装的失业状态,在尚未离开农业部门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农业劳动人口自己维持的。在城市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部门,从而工业工资水平也大大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业工资与农业劳动者糊口收入的差异,如果没有人为的障碍,必然促使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由于有农业剩余劳动源源不断的供给,可以有利地扩大再生产,累积利润,并将利润转化为资本,更多地雇用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更大规模地扩大生产,更多地累积利润,再将利润转化

为资本。如此反复进行，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吸收罄尽为止。此时，工业部门也大大地扩展。至于农业，只有等待剩余劳动消失之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有所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才能有所改善。

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含有三个基本论点：

第一，突出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工业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

第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工业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工业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

第三，在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农业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总之，二元经济结构改造的主要方面是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方面。工业部门是积极的、能动的；农业部门是消极的、被动的。

体现重工轻农的思想的第二种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另一先驱人物之一的赫尔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的一部分产业是哪一类产业呢？赫尔希曼说，应当是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在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中，又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联系效应，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产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关系分为两种：“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指一个产业同对它提供投入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如和钢铁工业有后向联系的产业是采矿业等。前向联系指一个产业同吸收它的产出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如和钢铁工业有前向联系的产业是机器制造业等。赫尔希曼还认为，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业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因此，农业的联系效应较弱，从而农业不能成为优先发展的产业。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工业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联系效应因此比较强，从而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

优先发展的工业应当是哪一类的工业呢？赫尔希曼认为，应当是进口替代工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往往缺乏后向联系，即缺乏某些本国暂时还不能生产的机器设备、半成品、原材料等。对所需的这类投入，如果从国外进口，必将花费发展中国家常感缺乏的外汇。因而工业发展受到投入短缺和外汇不足的双重约束，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工业投入的来源，减少进口，节约外汇，而且由于进口替代工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有关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被带动起来，从而可以在尽量减少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的前提下，尽量多使用本国原材料、中间产品等的投入，生产出国内工业发展急需和人民生活必需的产品，当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逐步由工业消费品生产为主转向资本品生产的扩大，进而完全取代工业投入的进口，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含有三个基本论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必须在产业部门中有优先次序的选择。

第二，联系效应强的产业应当优先发展，农业是联系效应很弱的部门，它不能列入优先发展产业的清单之中。

第三，按照联系效应强弱的标准，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投入短缺和外汇不足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

体现重工轻农思想的第三种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又一个先驱人物普雷维什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理论。

普雷维什认为，出口初级产品（指农产品和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品的发达国家，在贸易条件上前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一种历史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普雷维什把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归因于初级产品与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配上有所不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产业的技术进步，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速度，从而贸易条件应当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化。但是，情况刚刚相反，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根据这种分析，普雷维什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中心点是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理论，含有三个基本论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

第二，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日趋恶化。

第三，要改变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上述流行于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并非完全谬误，而各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刘易斯的理论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这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强化了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在“唯工业化论”的思想影响和支配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误认为工业化就是经济发展，把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投入制造业部门，而对农业投资甚微，结果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民经济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倾斜，工业增长较快，而农业长期停滞。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都很低。50年代各约0.6%，80年代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人均粮食生产增长率为0.1%，人均农业生产更出现了零增长。农业的长期停滞，抑制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得到较大的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唯工业化论种下的恶果。

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重工轻农思想，如果不是谬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

事实上，在重工轻农思想风行的50年代，已经有个别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如瓦伊纳在1953年就指出：“经济进步也许要求更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应当是一种由政府适当推动、却非在温室条件下扶植起来的自然增长，在许多国家中，促进快速经济发展的最有前途的领域是农业，而需要作出的措施主要是注重卫生，普及教育、进行技术训练、改善运输设施和低息农村信贷，制造业不具有对农业的内在优越性，农业也不具有对制造业的内在优越性。……如果需要政府在发展农业或发展制造业之间作出选择，就应当从理性的根据出发，考虑一国稀缺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不同配置上所付出的成本和取得的比较报酬。”^①

二、第二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重新认识。

正如两位西方农业经济学家所说,60年代以后,“关于农业和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的经济学说已经历了明显的转变。从早期‘唯工业化论’转到强调农业生产的增长对总发展过程的意义。”^②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鉴于前期理论的片面性和政策的过度倾斜造成了农业的停滞。他们对重工轻农思想,特别是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刘易斯无限剩余劳动模式提出了批评,例如著名的发展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指出:“他们论点的要害是:农业机会是经济增长中最缺少吸引力的资源;农业投资是得不到保证的;工业化是首要的。农业可以提供工业化上马所需的资本;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无限的劳动供给,农业甚至可以提供大量的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因为农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边际生产率为零这种含义的多余劳动力。需要采用的政策和行政手段是把粮食价格继续压低到有利于城市消费者的水平,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正常经济刺激是无反应的,甚至往往作出悖于常规的反应,例如农产品的供给曲线会出现弓形;现代化农业投入有不可分性,从而只有大农场才能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③舒尔茨批评说:“……这种发展经济学思路植根于大萧条时期因大规模失业而产生的经济思想,‘伪装失业’概念被延伸到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工业的国家,并由此而产生了这些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劳动具有零值边际生产率的理论。”^④

第二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还从几个方面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看法。

1.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具有特殊性质

他们认为,只是从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去观察农业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农业本身的性质去认识它的重要性。他们说:“了解农业的性质是了解发展的基础。”^⑤

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性质提出一种新颖看法的是舒尔茨,他把发展中国家农业叫做“传统农业”,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技术停滞,从而很贫穷。传统农业虽然很贫穷,但有效率,在既有技术条件下,它的要素配置已达到最佳状态。^⑥

此外,他们还有如下看法:

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总和还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率一般是60—70%。对比起来,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一般在10%以下。

农业已有几千年历史,受到历史传统的束缚,发电、制造汽车,必须用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而农业还在使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使用过的技术,由于此,农村中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往往是安于现状,不愿改革。

农业中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地面的广狭,地力的肥瘠、气候的冷热等等,都深刻地影响农业生产,也造成了农业独具的、深深地受自然制约的脆弱性。

农业是唯一能生产粮食的部门。没有钢、煤或电,人可以活下去。而没有粮食,人就难以生存。工业品一般是有替代品的,而粮食则不然,一个国家必须自己生产粮食,或进口粮食。农业这一特点,对人口基数大的发展中国家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比从事工业的人数将相对地减少,从事工业

的人数比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又将相对地减少。但这一历史趋势并不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相反,对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农业生产人民所需的粮食和工业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以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部门的继续增长,必须要求作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继续增长,粮食的问题就更严重。虽然按照恩格尔法则,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将趋于减少,但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在相当长的时期,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将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一般较快,加上城市化,又增加粮食的需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部门必须不断地提高生产,增加产出。

其次,农村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市场必将不断扩大。因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如果是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化肥、农药、薄膜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是机械技术的进步,则农用机械设备,燃油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同时,农业生产的增长使农民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对工业消费品的增长。

再次,工业所需的投入要得到农业的支持。在发展初期,城市人口比重很小,工业扩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不可能由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来满足,而必须依靠农村丰裕劳动力源源流入城市来不断补充。除劳动力的投入外,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在发展初期,工业部门的比重很小,依靠自身的积累来扩大生产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从在国民经济中尚占很大比重的农业部门转移其“可投资剩余”而积累资本。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把农业的“可投资剩余”转移到工业,有两种方式:依靠市场力量的自动转移和依靠国家的强制转移。就前一方式而言,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如农业必须有“可供市场的剩余”、农民有净储蓄超过他们在农业上的投资等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快速累积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往往运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把农民的“可投资的剩余”转移到工业。他们这样做时,或者采取间接的方式,如通过间接税及汇率调整以相对地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工农产品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或者采取直接的方式。如征直接税,对农产品的强制性地按低价收购等,或者两种方式兼而有之。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强制性地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建设的作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效率不能提高,甚至生产停滞,不利于农业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在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能力薄弱,而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尚占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因此,农业部门在出口创汇方面可以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果粮食短缺,要指望进口来弥补,就必须付出外汇,但用有限外汇来进口只供消费的粮食,而不进口国内需要却无力制造的资本品,其机会成本不免太大,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农产品进口替代战略。总之,农业进步是发展中国家常感短缺的外汇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发展初期,尤其如此。

对于上述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并不是完全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同。当他们注意到农村是工业品的市场,是工业劳动力,资金和所需外汇的来源时,他们只强调农业是工业化的默默的,“毫无怨言的”奉献者,而未认识到,农业的继续进步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如不久前一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说,他们在论述农业时,只提出“贡献”(contribution)这一含有被迫意味的概念,而未积极地强调它的“作用”(role)。^⑦

从上述分析，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已有这样的共识：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形似矛盾而实是统一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一是一般经济增长必须伴随着快速的农业增长，甚至以快速的农业增长为前提。^⑥

3. 农业经营不必追求大规模

曾经有人认为，规模经济不只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因此，大农场的生产效率高于小农场的生产效率。现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已不同意这一观点，而认为这种观点虽然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在传统农业中，小规模经营比大规模经营可能更有效率，这是因为：

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和地区，土地是稀缺的，而劳动是丰富的。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如果采用大农场制，资源将得不到充分而有效的配置，因为大农场制一般有以较少劳动经营较多土地的倾向，结果，丰富的劳动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土地的生产潜力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而小农经营则是以较多的劳动在较少土地上实行集约化耕作，从而既使劳动得到生产性就业，又提高土地生产率。

其次，传统农业一般不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规模，因为劳动和土地是主要投入，而资本投入很少。这样，规模经济效果是很小的，即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不明显，反之，随着经营规模缩小而单位成本上升的趋势也不明显。

再次，在目标函数上，大农场和小农场是有区别的，前者的目标函数是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目标函数是产量最大化。这是因为，大农场经济基础雄厚，足以应付生产的不确定性，遇上灾年，也能维持，从而可以遵循效率原则，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小农经济基础薄弱，常感生产不确定的威胁，遇上灾年，就难以为继，从而必须遵循生存原则，尽可能多提高生产以防不测，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就劳动而言，即是工资率等于边际生产率。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利润会降低，农场将减少使用劳动。而产量最大化原则，要求的是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直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止。因此，比起大农场，小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集约化耕作。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

最后，小农场可能比大农场更能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益与农民的利益直接联系，多一分耕耘，就多一分收获，因而农家的每一成员都会自觉而勤奋地劳动，从而更好地利用土地，增加产出。在大农场中，劳动者往往带着雇佣观点，在生产中缺乏积极性。有的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实地调查以证明上述看法的正确性，如1970—1971年，从印度的抽样调查中，发现1772个农场中，经营规模与土地收入成反比关系，25英亩以上的农场平均每亩收入只有346卢比，而5英亩以下的农场平均每亩收入为737卢比。^⑦

4. 农业投资要受到重视

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工业、特别是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而很少注意对农业的投资。这种重工轻农的投资倾斜是造成农业停滞的原因之一。70年代后，农业投资的重要性受到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农业投资中，基本建设（如灌溉系统，道路交通、储藏运输等）投资极为重要，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延长农产品的效用并保证其质量，以及迅速传播市场信息和推广新技术知识。基本建设属于社会分摊成本，它需要大量资金，而又不能独家享益，因此，国家必须承担或组织这方面的投资。但比较小型的、耗资不多的、较小地区受益的农业基本建设，则可以由农民自己联合起来进行投资。如农闲时，他们可以自己组织起来，以劳动密集方式兴修小型水库，小水渠，乡村道路等。

5. 促进农业要靠技术进步

舒尔茨强调说,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不进行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不能转变为现代化农业,所谓技术停滞,指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世代都同样地耕着和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⑩

传统农业需要技术改造,但又不易引进现代化技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信息传播不灵,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其次,采用新技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农民对传统技术熟悉,对新技术陌生,熟悉的技术较易保证收成,而陌生的技术是否能保证收成,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的贫困处境往往使他们不能冒着风险去使用新技术。同时,引进现代化技术需要资金,而传统农业是缺少资金,又不易融通资金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化技术一般是节约劳动而非节约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却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充裕,所需要的是节约资本而非节约劳动的适宜技术。

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另外的不同特点,如美国的土地丰富而劳动力稀缺,因而农业技术的革新一般偏于以节约劳动为主的机械技术革新。日本的资源条件与美国相反,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因而农业技术的革新一般偏于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在亚洲几个国家和墨西哥的“绿色革命”,即是一种生物技术革新,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人口基数大而土地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生物技术革新。

从上述分析,发展经济学家提出,要谋求农业进步。必须实现传统农业的技术改造,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融通信贷资金,推行保险制度,传播科技信息、到进行推广培训,以促进农业得到合理的、适宜的技术革新。

6. 应当执行正确的价格政策

对农业影响最大的价格比是工农产品的价格比。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重工轻农思想影响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认为:农民对价格刺激缺乏灵敏反应,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不利于工业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的城市居民,而且为了加速工业化,农业部门必须而且应当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尽可能多的剩余。因此,一般采取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价格政策,形成“剪刀差”现象。

这样一种人为地扭曲的价格政策,不仅大大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利益,促使其停滞并恶化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对这样的价格政策作了多方面的批评:首先,他们指出,农民是具有理性的,对价格的变动是敏感的、并能作出适当的反应。其次,以降低贸易条件的办法来调动农业剩余的办法是短见的,损害了农业,最终将损害工业,最后,粮食价格过高会影响城市人民,特别是低下阶层的生活,但可以用补贴之类的措施来解决这一困难。总之,应当取消以损害农业利益为代价、照顾工业、照顾城市人民的价格政策。

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从长远观点制定稳定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丰收时,国家多收购农产品以防其价格过分下跌;歉收时,国家抛售农产品以防其价格过分上涨。为此,国家应当建立“缓冲储存”基金。

7. 必须重视农村教育

50和60年代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未尝不发展农村教育,但问题不少。如初等教育在农村不如在城市那样普及,而农村初等教育还往往脱离实际,不给学生以较多的农业实践机会,

以致他们当中大多数毕业后不继续升学的人，对农业并不熟悉，而且安于传统农业的现状，不愿改革；中等学校很少进行农业技术训练和推广的教育；城市中的高等学校农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农学家，在校时只注意课堂和书本的学习而很少到农村作田间实习，参加农业劳动，毕业后对自己国土上的农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不愿在农村工作和生活，结果不能对改造农业发挥积极作用。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反复强调农村教育的作用。他指出，农村教育不发达，农民文化落后，造成了传统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教育投资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形成，它对农民知识技能的提高、专业化的促进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发展经济学在演变过程中，对农业的看法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只作牺牲、只作贡献的看法，转而认识到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农业不只限于起辅助作用，而需要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正如一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说，农业战略应当是城乡平衡的战略；如果说，在前两个10年中，农业似乎只有“工具价值”，以后几个10年中，农业必须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⑩

三、借鉴意义

1976年以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生产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6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大跃进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三年连续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文革动乱波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在近30年期间，我国的农业发展虽在一些方面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规模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但总的说来，对农业的主动作用和积极作用是认识不够的，重工轻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表现在农村体制的变化过快，长时期滥用行政手段，对农业的剩余劳动强制转移，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等等。从而挫伤了农民对于农业劳动和农业经营的积极性。因此，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不能不首先从农业开始。

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会议公报说：“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农业生产，……逐步实行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8亿农民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的2827亿公斤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的4098万担增长了205%

但是，我国农业1979—1984年连续6年高速度增长，特别是1984年大丰收之后，农业开始滑坡，1985年粮食大量减产后，1986—1988年又出现新的徘徊。1988年比1984年粮食产量减少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消费量增加200亿公斤，粮食的需供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粮食徘徊不前，农业增长速度放慢，形势不容乐观。

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主要是政策上的失误，表现为：1985年国家改变了原来粮、棉大宗农产品的超额加价政策，采取了合同定购政策，从而降低了农产品总价格水平，使调动起来的农民积极性再度受挫；工农产品“剪刀差”重新扩大，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农业成本在收入中所占比率从1984年的26.6%，上升到1987年的48.6%；国家投资的工业倾斜，对农业投资逐步削减，使工农业增长速度比例趋于更不协调，农用产品工业发展迟缓，1952年—1980年期间国家对农用工业的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重的4.2%，下降到1981—1985年期间的1.8%，使工业支农力量逐渐削弱；农业信贷资金过少，而且被大量挪用、挤占。总之，如一些同志所说，我国农业政策的不合理性，不协调性、不连续性，是近几年来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和徘徊的主要原因。^②

比照我国建国以来40年经验教训，可以看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重要性再认识的分析论证中，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并足以引起我们对振兴农业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建议的思考。

第一，必须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牢固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充分认识农业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不能不承认，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战略，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强化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倾斜发展战略。农业始终被放在服从于、隶属于、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次要的、消极的、被动的地位。当农业形势转好时，就只从如何多调农民的剩余作考虑，当农业形势转坏时，又只作修修补补的调整和挽救，以致农业总是反复出现困难，而根本问题总未能解决。今后，必须彻底清除重工轻农思想，保证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牢固基础。

第二，必须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

家庭承包制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经营，而家庭小规模经营是符合地少人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合理经营的原则的。我国农村劳动资源极为丰富，而土地和资本相对地非常稀缺，在这种资源条件下，小农生产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充裕的优势，而节约资本和土地，使成本尽可能低，产出尽可能高，从而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小规模农产经营的这种优点，曾片面强调大规模集体经营，并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更应当充分肯定推行了10年并取得了巨大成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而不能怀疑动摇。不要认为大生产一定比小生产优越，更不要把大生产简单地理解为规模的扩大。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逐步实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服务。

第三，必须对农产品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按价值规律办事进行必要的农产品价格改革，以解决当前存在的比较利益悬殊问题，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改变工农业产品不合理比价关系，使农业劳动者得到相当的劳动报酬和投资利润，以刺激农民的务农热情和增加劳动投入。由于我国农产品供给不足现象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会消失，而市场又很不完全，因此还不能完全让市场来调节农产品价格，而必须辅以行政、税收、金融等手段，使价格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第四，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我国农业生产的增加，不能靠土地面积的扩大，而要靠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与农业劳动者的质量和技能有密切关系，为此，必须发展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素质；必须发展农业科技，以提高农民的技能 and 农耕的技术水平。应当看到当前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和辍学率较高所造成的后果，努力改善农村教育的现状。

第五，必须重视对农业的投入。广义地说，农业投入包括农业的基础设施，如水堤、灌溉系统等。过去几年中，由于农村组织处于改革和调整的过渡阶段，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水利

失修、沟渠荒废的情况，这必将削弱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应当注意到由于资金不足，水利工程维修无法进行的困难。国家应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也应当采取适当政策以鼓励农民对土地的资本投入。

第六，应当进行必要的农村金融改革。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必须给农民以资金融通和信贷便利，为此，应当建立有效、多元化的中间媒介，为农村各种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农村金融改革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提高专业银行效率，一是试验性地发展民间金融组织。

第七，应当注意释放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不释放这些剩余劳动并为其找到出路，农业生产率就很难提高。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不少农业剩余劳动，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如乡镇企业繁荣使农民产生不愿务农的现象，于是一些乡镇企业越发达的地方农业萎缩现象越严重。不少乡镇企业管理不善，浪费资源能源，争夺稀缺原料，污染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效益很低。这些情况，亟待改进。

第八，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教育干部和群众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建立责任制。

注释：

- ① 瓦伊纳：《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1953年英文版，第51—53页。
- ② 连水佑次郎和拉坦合著：《农业发展，一个国际观点》，1985年英文版，第11页。
- ③ 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续集，1987年英文版，第20页。
- ④⑥⑪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英文版，第20页，24—25页。
- ⑤ 吉利斯、帕金斯等合著：《发展经济学》，1987年英文第2版，第491页。
- ⑦⑧ 钱纳里和斯里瓦尼桑合编：《发展经济学手册》，1988年英文版，第289，276页。
- ⑨ 贝利和克莱因合著：《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结构与生产率》，1979年英文版，第149页。
- ⑩ 迈耶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1984年英文版，第431页。
- ⑫ 参见万宝琦、殷尔信等：《农业形势与战略调整》，《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5期。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

（上接19页）

望，而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团结基础上所进行的持续的联合斗争。

（四）多极化发展与国际政治形势。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封锁和限制，是造成冷战局面和国际形势紧张的最主要根源。其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峙和展开军备竞赛，当时，其它国家的力量还不足以制约它们的行动，东西方之间关系一直紧张，各国人民不得不生活在美苏核恐怖均势的阴影之下。近20年来世界经济中的多极化发展，标志着美国力量的衰落和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时期的终结，从而为国际局势走向缓和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多极化的国际新格局下，美苏双方为摆脱各自的经济困境并加强同欧共体与日本的竞争力，决定了它们都希望从军备竞赛降级中谋求出路，这正是国际政治走向缓和所需的重要条件。而随着多极化趋势的继续发展和新极的出现，即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相继进入“经济中心”即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则国际政治缓和将具有更牢实的根基。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这种多极化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大特点，并且是逐步走向世界经济即全球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经阶段。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